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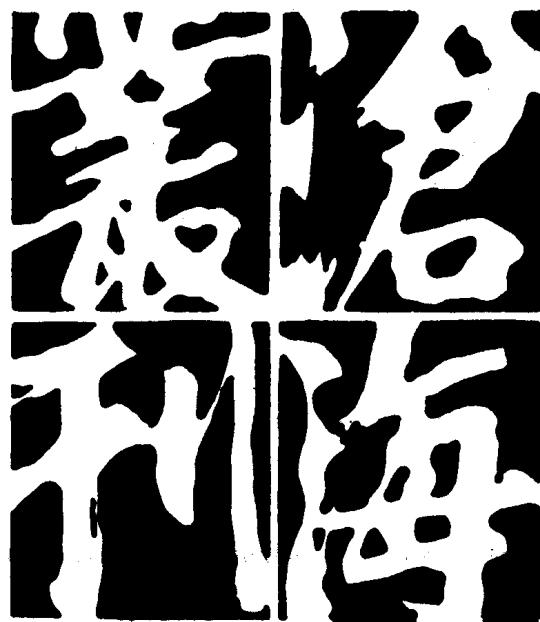
滄海叢刊

大陸新時期文學（1977-1989）
：理論與批評

唐翼明 著



T2
T2



大陸新時期文學：理論與批評
(1977-1989)

唐翼明 著

東土圖書公司 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大陸新時期文學(1977-1989)：理論與
批評／唐翼明著。--初版。--臺北市：
東大發行：三民總經銷，民84
面： 公分。--（滄海叢刊）
ISBN 957-19-1768-0 (精裝)
ISBN 957-19-1769-9 (平裝)

1. 中國文學-評論

820.7

84002456

◎大陸新時期文學(1977-1989)：理論與批評

著作人 唐翼明
發行人 劉仲文
著作財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產權人 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發行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郵 撥／○一〇七一七五—〇號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重南店／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初 版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四月
編 號 E81075
基本定價 叁元陸角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ISBN 957-19-1769-9 (平裝)

目 錄

第一章 導言 ······	一
第二章 艱難的起步——掙脫枷鎖的努力 ······	九
一、從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到批判「文藝黑線」論 ······	九
二、《上海文學》評論員文章：〈爲文藝正名〉 ······	一三
三、「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 ······	一八
四、重估馬、列、毛的文藝理論 ······	二二

第三章 乍暖還寒時候

二二五

一、小說《傷痕》所引發的爭論

二六

二、「劇本座談會」前後的風風雨雨

三一

三、對《苦戀》的批判

三四

第四章 人性和人道主義的呼號

四一

一、對人性和人道主義的重新肯定

四二

二、關於「異化」的爭論

四七

三、人性、人道主義與文學

五一

第五章 圍繞現代派的爭論

五七

一、「朦朧詩」與「看不懂」

五八

二、三個「崛起」與新的美學原則

六一

三、《現代小說技巧初探》

六六

四、戲劇觀念的變革.....七〇

第六章 現實主義面臨挑戰.....七五

- 一、現實主義和它的各種口號.....七六
- 二、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共存共榮.....七九
- 三、「複雜性格的二重組合」說.....八二

第七章 文學主體性的旗幟.....八七

- 一、劉再復「文學主體性」的基本論點.....八八
- 二、陳涌等人的駁難.....九一
- 三、餘波不息.....九四

第八章 文學批評新方法的浪潮.....九九

目

3

第九章 新的美學原則的真正崛起	一一一
一、文學觀念的新變	一一二
二、文體意識的覺醒與文體批評	一一五
三、關於「偽現代派」的爭論	一一〇
第十章 重寫文學史（並後記）	一一一
參考書目	一三一
〔附錄一〕大陸新時期前十年的三股主要文學思潮	一三三
〔附錄二〕王蒙的藝術革新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	一六三

第一章 導言

大陸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以來四十餘年，大別之實不過兩個時期：毛澤東時期（一九四九—一九七六）與鄧小平時期（一九七七至現在）。大陸當代文學的發展也可以分為這樣兩個大時期。本書的意圖是盡可能平實地、扼要地向台灣讀者介紹鄧小平時期大陸的文學理論與批評之概況。鄧小平時期（尤其指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前）大陸文壇上通常稱為「新時期」，以別於毛澤東統治的時期，為方便起見，本書亦從衆沿用此一名稱。至於毛澤東時期大陸文學理論及批評方面的情形，限於篇幅，只能從闕，而僅在第一章中略作介紹，以為讀者閱讀本書之必要準備與參照。

所謂文學理論與批評，主要包括以下三個層面：

(一) 對文學的本質與規律的認識，偏於學理性的研究與理論體系的建構；

(二) 對文學及文學活動提出的思想主張，常與創作互相呼應、互相推動，形成一個時期的文學思潮；

(三) 對具體作家、作品的介紹與批評，於其褒貶之中，往往可見一時文壇之好尚或禁忌。

本書介紹大陸新時期的文學理論與批評概況，將盡可能同時照顧到以上三個層面，而以第二層為重點，蓋與實際發生的文學活動直接相關之理論與主張，往往最能顯示此一時期之文學與社會政治發展之關聯。

文學理論與政治的關係密切，在中國是有傳統的。儒家詩教所謂「溫柔敦厚」，所謂「興觀群怨」，所謂「思無邪」，皆莫不與政治教化有關。歷代有關文學理論方面的爭論，也往往與當時的政治風潮息息相通。而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社會，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在人為的操縱下，更是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病態的密切。大陸文壇過去有一句口頭禪，曰：「文藝是階級鬥爭的晴雨表。」文學理論自然就是這晴雨表上最敏感的部分。毛澤東四十年代在延安作了一次關於文藝問題的講話，此後幾十年內，凡與此講話的思路稍有違逆或不合的理論與主張，就不僅被視為文藝上的異端，而且要在政治上加上反動的罪名而予以整肅。中共歷次政治運動幾乎一例外地以文學理論的爭訟鳴鑼開道，演至文化大革命，政界權傾一時之顯要

如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輩，竟都是操弄文藝理論與批評的能手，也就是一種合乎邏輯的荒謬了。

因此，考察大陸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就不能不特別注意其與政治的病態密切關係這一特色，尤其考察毛澤東時期更是如此。

爲了說明新時期的文學理論與批評，有必要先簡略回顧一下毛時期的情形。

毛時期的大陸文學的發展通常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前夕，大陸文壇通稱爲「十七年」。第二階段則是文革的十年。

先說「十七年」。

考察「十七年」的文藝理論與批評，有如下幾點值得注意。

一是這個階段的文藝理論與批評受原蘇聯文藝理論與批評的影響極大。一方面突出強調文藝的社會功能，使文藝從屬於政治，要求文藝爲政治服務，沿襲、甚至發展了蘇聯共產黨領導文藝工作的一套做法。蘇共的一個領導人日丹諾夫曾經公開指令「文學領導同志和作家同志都以蘇維埃制度賴以生存的東西爲指針，即以政策爲指針」，「把思想戰線拉上，與我們工作底其它一切部分並列在一起」①。而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共召開的第一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當時位居要津的周揚也強調必須學習政策，「將政策作爲他觀察與描寫生活的

立場、方法和觀點」^②其實就是日丹諾夫理論的翻版。這種觀念，在許多文藝界領導人的頭腦中，可謂根深蒂固。

二是毛澤東本人以其領袖兼導師的身分，對文藝理論與批評，施展了絕大的權威，將其理論主張變成不可觸犯的金科玉律，和指揮文藝運動的號令。他在戰爭年代所作的關於文藝問題的講話（即〈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二年五月）中曾提出許多重要主張與論點，例如「文藝必須從屬於政治」、「文藝必須為工農兵服務」、「生活是文學藝術的源泉」、「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衆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衆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沒有超階級的人性」、「沒有普遍的人類之愛」、「歌頌革命、暴露敵人」、「知識分子必須改造世界觀」等等，成爲爾後中共制訂文藝政策的依據，同時也就成爲大陸文藝理論與批評的基礎與準繩。五十年代以後，隨著中共最高領導層的不斷左轉，毛的這些論點更被一些正統理論家發揮到荒謬的極致，且化爲文藝運動與政治鬥爭中打擊異己的殘酷武器。毛本人也往往親自出馬，以身作則，把文學藝術與維

① 日丹諾夫：〈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報告〉，見《蘇聯文學藝術問題》。

② 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在全國文學工作者代表大會上關於解放區文藝運動的報告〉，見《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

護政權結合起來，借文學藝術作政治鬥爭的突破口。從〈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九五一年五月）開始，他連續親自撰寫了〈關於紅樓夢研究的一封信〉（一九五四年十月）、〈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材料的序言和按語〉（一九五五年五一六月）、〈關於文學藝術的兩個批示〉（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及一九六四年六月）等文，不僅挑起文藝界一場又一場充滿刀光劍影的批判，而且多半隨之引發狂風暴雨式的政治運動，使成千上萬的作家、藝術家、學者受到殘酷的整肅。大陸文藝理論與批評同政治行為的如此病態性的密切關連，不能不說與毛澤東個人的獨特思維方式與統治方式有關。

第三，與第二點相連的，是這十七年中，大陸文學藝術界處於接連不斷、一波又一波的批判、鬥爭、清算之中，人人自危、萬馬齊喑，而文學理論與批評也就越來越左。中共建國不久，全國規模的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運動便拉開了帷幕，先是對電影《武訓傳》的嚴厲批判，並由此引起批判「小資產階級創作傾向」，繼之是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及對胡適「唯心主義文學史觀」的清算。接踵而至的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運動和「反修」（即反蘇聯修正主義），在此政治形勢下，文藝界發動批判所謂「厚古薄今」、「拔白旗」，批判「中間人物論」等，階級鬥爭的火藥味愈來愈濃。即使如此，毛澤東在其〈兩個批示〉中還把「十七年」的整個文學藝術宣判為：「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

行黨的政策」，「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在這樣的政治高壓下，正常的、理性的文藝理論與批評已不能抬頭。

隨後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這十年的情形，舉世皆知，毋需多說，文藝理論與批評同各種創作一起，進入了封建文化專制主義的全面黑暗之中。「八億人民八個樣板戲」，而文藝理論與批評則只有江青等的「一家之言」。所謂「根本任務」論、「三突出」原則和「寫鬥走資派」（即「寫與走資派作鬥爭的題材」），是這「一家之言」的主要論點。

一九六六年二月，江青受林彪委託，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會後發表《紀要》，提出所謂「文藝黑線專政論」，聲稱：「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的結合。」大舉討伐所謂「黑八論」，即：「寫真實」論、「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論、「現實主義的深化」論、「反題材決定」論、「中間人物」論、「反火藥味」論、「時代精神匯合」論、「離經叛道」論，力圖將文藝界掃蕩成一片「空白」，以開啟其「新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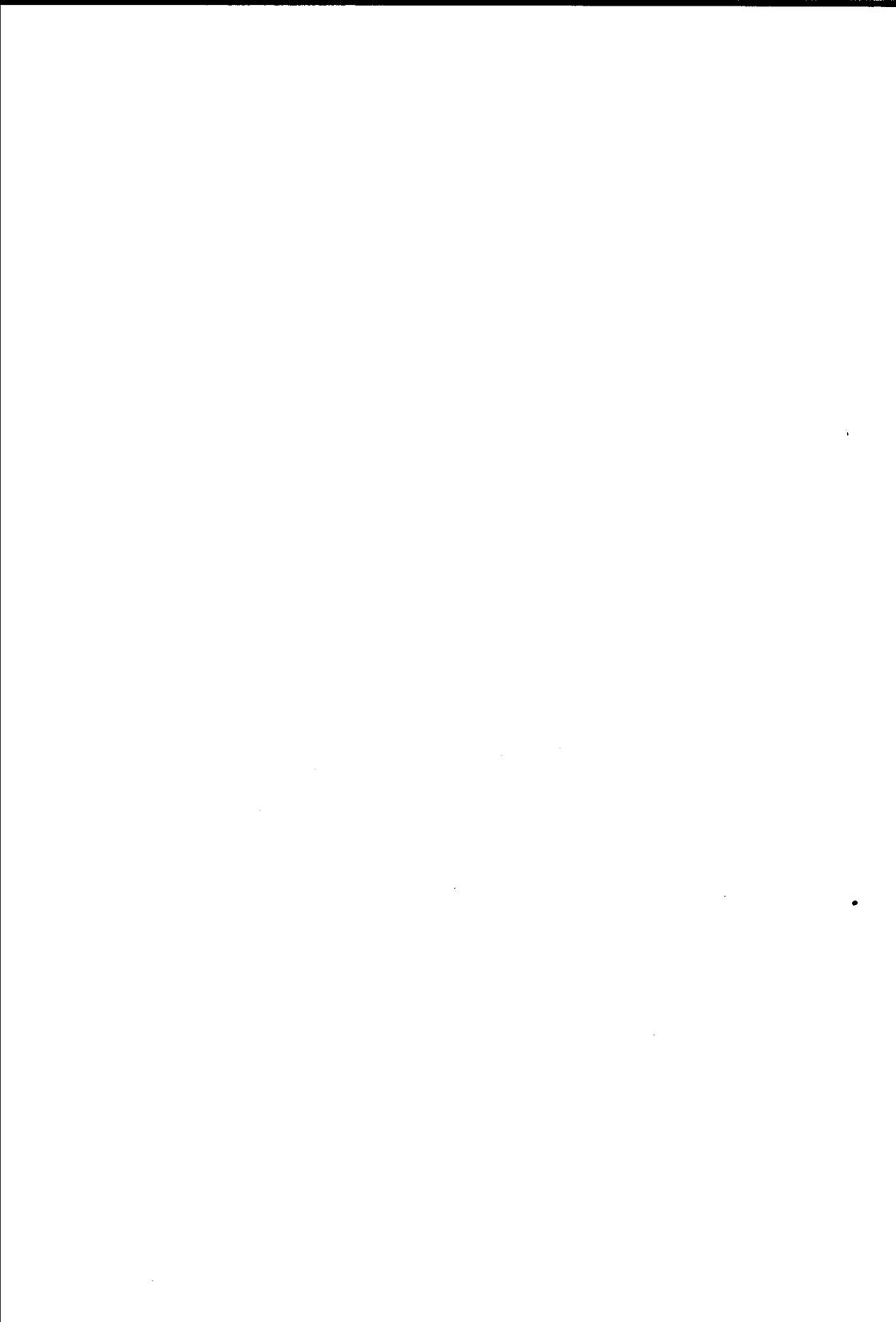
《紀要》中提出的所謂文藝的「根本任務」，就是「要努力塑造工農兵的英雄人物」。這種人物的特徵是「高、大、全」（崇高、偉大、完美）。如何塑造這種人物呢？江青及其御用

文人設計了一套被稱之爲「文藝憲法」的「三突出」原則，即是：「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❸由此原則出發，又衍生出「三陪襯」、「多側面」、「多浪頭」、「多回合」、「多波瀾」、「多層次」和「起點高」等一整套「三字經」創作模式，可謂將教條主義、公式化和造神術推至極致。

大陸此一時文學理論與批評之「左」，可謂登峰造極。同時也就走入了絕境。正常的一般意義上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已不復存在，剩下的只是粗暴的赤裸裸的政治批判與政治陰謀。

以上我嘗試對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毛澤東統治時期大陸的文學理論與批評之概況作了一個回顧，我希望這個極其簡略的回顧多少能幫助本書的讀者進入狀況，掌握一些背景資料，從而懂得大陸新時期的文學理論與批評是在怎樣一種基礎上起步的。

❸ 見〈努力塑造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光輝形象〉，《紅旗》一九六九年第十一期。



第二章 艱難的起步

——掙脫枷鎖的努力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去世，十月，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即所謂「四人幫」，一夜之間，成了階下囚，長達十年的一場民族浩劫，總算到了頭。

然而瘡痍滿目，百廢待舉。更嚴重的是人們的頭腦長期為極端專制的意識形態所禁錮，雖然大家都意識到一個舊的時代已經結束，卻並不懂得能否和怎樣去開創一個新的時期。「黎民於變時雍」，然而舉步維艱。文學界，尤其是理論與批評，自然不能例外。

一、從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到批判「文藝黑線」論

毛澤東去世後，華國鋒成爲執行「既定方針」的繼承人。接著，他與中共元老葉劍英等人聯手，擊敗了「四人幫」，被尊爲「英明領袖」，集黨政軍權於一身。華國鋒的治國綱領是「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在這樣的氣候下，要想對建立在毛的教條的基礎上的中共文藝理論與政策進行任何改變的嘗試自然都是十分困難的。此所以江青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由於同毛澤東對文藝問題的態度有關，竟然能夠在四人幫垮台後兩年之久的時間裡完全不受觸動。直到鄧小平於一九七七年復出，並逐漸將權力從華國鋒手中移轉過來之後，這種情形才有了較大改變。

一九七七年底，《人民文學》編輯部於北京召開文學工作者座談會。會議的主旨是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與會者認識到，「文藝黑線專政」論乃是林彪、江青一伙人用以殘害文藝工作者的政治刑具，是他們奪取領導大權的理論武器，必須否定。基於此種共識，曾被四人幫橫加罪名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長篇小說《創業史》、《紅旗譜》、《紅岩》、《青春之歌》、《劉志丹》、《上海的早晨》，歌劇《洪湖赤衛隊》、電影《林家鋪子》、《早春二月》、《舞

● 見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